

第一章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建立的条件和准备

中国共产党北海地方组织的建立，是近代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是在北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阶级求生存、谋解放的客观要求。鸦片战争后北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近代北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鸦片战争与西方列强对北海的入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订立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操纵了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北海是近代中国被迫实行门户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北海——这颗镶嵌在北部湾的璀璨明珠，自汉武帝时起就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源远流长。北海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处在中国华南、西南、中南和东南亚结合部的中心位置，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广东南路的主要港口，是与东南亚各国贸易的商埠，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近代，北海是帝国主义从南方入侵中国的一个重要口岸。英国殖民主义者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看中了北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条件。1851年，英国商船“兹依亚”号从香港首航北海，该船船长可尔秉承英国政府的战略意旨，绘制并测量了北海港海图。1863年，第一艘满载货物的英轮进入北海港。自此，英国闯开了北海的门户。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达到长期占据北海、打开进入中国西南和广西腹地门户的目的，1876年9月，以马嘉理案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将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辟为通商口岸。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北海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把北海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1877年3月18日，英国在北海设立领事馆，4月1日，通过清总理衙门府向世界宣布，北海正式开埠，并精心安排一艘英国货轮抵北海港装卸货物作为开埠的象征。还设北海厘金厂，廉州、钦县（今钦州市）设分厂，专收海船出口货物厘金税。1879年，英国又以皇家海军的名义向世界公布了北海港海图。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军在中越边境

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挑起战端。1885年春，法国的两艘军舰封锁北海港，检查出入港商船，欲防止从海上输入武器接济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前线的清军，兼窥探北海防务虚实。当北海民众在冠头岭一带扫墓而烧纸钱放爆竹时，法国军舰误认清军采取军事行动，连续发炮轰击3小时，幸扫墓军民无一伤亡。随后，因与北海口岸通商的各国政府抗议，法国军舰才停止检查进出商船。当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时，两广总督张之洞获悉法军有偷袭北海企图，急调原署高、廉、雷、罗4镇总兵梁正源率部驻防北海，筑地角岭炮台及乾体港（合浦港）“红坭城”屯兵固守；令总兵李起高（合浦平田人）率领由北海子弟组成的广东西路边防团练协助防守。这样，入侵北海港的法国军舰企图在北海登陆抄袭镇南关后方，因慑于北海守军的威力而未得逞。不久，法国军舰离去，历时3个月的北海封港结束。1887年、1902年，法国、德国分别在北海建立领事馆，各领事馆还分别代理着葡萄牙、澳大利亚、丹麦和荷兰的商务。这些资本主义强国都参与对北海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西方国家对北海不断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贪婪地攫取在北海的种种特权。

控制北海海关，操纵北海港主权。按照不平等条约规定，象征国家主权的北海海关税务司一直操纵在外国人手中，自1877年北海海关首任税务司由英国人李华达担任开始至1942年，北海海关税务司相继由英、美、挪、葡、俄、荷等10个国家的48位外籍人充任，而且海关的其他高级职务也全由外国人担任。清政府历次委任的监督和交涉员虽名义上与税务司官阶持平，但毫无实权，形同虚设，只负责一些公文事务，而税务司却包揽了海关的一切大权，包括人事任免、货物进出和船舶监管、旅客行李和邮递物品监管等，甚至可以擅自决定税率。因此，北海海关被称为“洋关”。外国人控制的北海海关不仅严重地侵犯了我国主权，而且也使北海港在政治、经济上遭受严重损失。外国军舰和商船抵港可不受检查、外国人可以通过北海海关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情报，插手中国内政，任意划定港口范围。他们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有关“海关行使港口管理权”的条文，取得了对北海港的管理大权，在北海海关中设立理船厅，专管港口业务，北海港的主权丧失殆尽。

实行贸易歧视，进行经济掠夺。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在经济上侵略和掠夺，首先便是冲破关税壁垒，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擅自降低或抬高税率实行贸易歧视，以达到掠夺和控制进出口贸易的目的。清政府曾根据中英《天津条约》有关条款对进出口货物一律按5%税率征收正税，但1858年英国强逼清政府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后，英国“帮办商务”摄取海关大权后，在北海海关实际上只征3%至4%正税，而外国人所谓的日常生活品则一律免税。到了1886年根据《中法天津条约》，北海海关对出口税又降为原税率的1/3，进口税则降为原税率的1/5，在如此低的税率驱使下，殖民主义者纷纷在北海大量倾销其出口商品，并大量廉价收购原材料。通过美、法、英、德、葡、荷等驻北海的7家洋行，控制了北海商业贸易的20%市场份额。与此同时，英国控制的北海海关还规定，进口洋货只纳关口税（关税），不纳厘（地方税），而华商进出口货物既纳厘又纳税，对华商实行贸易歧视政策，更甚的是竟规定清政府税务人员不得

上洋船查洋货。这样，北海港的对外贸易不仅出现了极大逆差，而且助长了外轮走私盛行。据统计，从1887年到1891年这5年间通过北海口岸进口的洋货估值为1605万两关平银，而土货出口仅价值454万两关平银，贸易逆差达1151万两关平银；从1890年到1899年这10年间，西方国家通过北海口岸推销了价值3000万两白银的洋货，而出口仅1200万两，这种对外贸易中的严重逆差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西方列强控制北海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北海变成他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前，外国传教士已到北海开展了传教活动。1867年，涠洲岛开禁，法国天主教会派神父随移民潜入岛内，开展传教工作，并于1882年兴建涠洲教堂，这是高、雷、廉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基地。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列强纷纷在北海建立各种各样的教堂、福音堂、修女院等。如1881年法国建立高雷廉教区主教府、圣德修院、女修院；1886年德国建立长老会（后改称信义会）；1904年英国建立安立间教会（后改称中华圣公会）；1909年美国建立新约教会（后改称五旬节会）。在北海的外国传教士中的一些人披着慈善的外衣，深入北海城乡各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霸占房屋田地，侮辱妇女，鱼肉乡里。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北海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在北海开办许多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设施。如法国办广慈医院、育婴堂、德华学堂、私立中法学校、私立培德学校、涠洲天主堂小学等；英国办普仁医院、麻风病院、男义学、女义学、私立贞德女校、华文中学、圣三一中学、私立华文学校、私立圣公小学等；德国办孤儿院、清华学堂、私立信义小学等；美国办私立建光小学等。西方殖民主义者企图从精神上奴化北海人民，从心理上征服北海民心，培植为他们在北海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势力。

到20世纪初，北海与全国各地一样，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近代北海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北海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北海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北海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地区，经济自给自足。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随着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海的封建社会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北海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北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导致一

部分农民和一批手工业者破产，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北海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北海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然而，西方列强侵入北海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北海变成资本主义的北海，而是要使北海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北海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北海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外国资本侵入北海主要集中于航运、进出口贸易和金融方面。西方列强将北海作为倾销其过剩商品和掠夺中国资源的中转口岸，使近代北海成为华南为数不多的海运大港，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每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均占有一定比例。从1900年至1911年，进出北海港的外轮达3243艘次，总吨位达221.8万吨，进出口总值达3698万两关平银。虽然近代北海航运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建造了精致、结构合理、吨位较大的风帆船，俗称“头艙”大船，载重200-300吨，专司香港和澳门航线运输。但外轮挤进来后，这种风帆船与外国蒸气轮船相比，其安全性能和经济效益都有很大的差距，本地帆船走一次香港，外国轮船可走三四趟。由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华航很快就退出了北海航运业，使北海航运业的发展受到阻碍。

西方列强通过海上贸易及兴办工商企业，由此也刺激了北海近代工业的发展，1879年北海出现了蒸汽轮船，1895年有了发电机和电灯公司，1919年北海成功地造出了机动木船。还有一批民族工业相继发展起来，如南强汽水公司、南方炼油厂、中国罐头公司等，从而带动了北海近代工业的发展。但这些工厂企业规模都不大，设备也较落后，尤其在洋货倾销的情况下，北海民族工业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有些工业企业甚至破产倒闭。1906年，国内商人在实业救国的影响下，发起组织成立“廉州铁路有限公司”，筹备修筑北海到南宁的铁路，以此抵御外国的侵略。公司以发动募捐的形式筹集资金，得到钦廉地区^[1]广大商人和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英、法帝国主义却千方百计地阻挠，法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声称根据旧约（1885年和1895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法新约》和《中法商务专案》），他们拥有筑路权，任何人不得介入，而英国却极力唆使清政府向各帝国主义借款，以便铁路建成后易于控制，腐败的清政府因哪一方都不敢得罪，遂把筑路之事搁置起来，廉州铁路有限公司只得解散，北海的民族资本家也失去了一个发展机会。又由于进出口贸易频繁，因此，使北海港区周围形成以珠海路为中心的商业网点，出现许多为外贸服务的金铺、钱庄、酒楼、茶馆、旅社和销售国内外产品的小商店，妓馆、烟馆、赌馆和神庙林立，商业和服务性行业发展迅速，使北海的经济出现畸形发展。

北海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北海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北海96%以上的人口在农村，而自耕农仅占农村人口的20%，其余多为佃农和雇农。农

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北海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外国在北海的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北海国民经济的命脉，使北海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北海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

在政治上，按照不平等条约规定，象征国家主权的北海海关税务司一直操纵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包揽了海关的一切大权，包括人事任免、货物进出和船舶监管、旅客行李和邮递物品监管等，甚至可以擅自决定税率。外国人控制北海海关，北海港的主权丧失殆尽，北海的内政、财政等无一不受到西方列强的操纵和控制。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由于近代社会是被扭曲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北海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有了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种种表现。因经济落后，城乡存在大量失业人员，从而滋生了城市贫民群，存在着大量的流氓无产者。一些无法改变现状，又贪图享乐的人，崇洋媚外，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为榜样，崇尚暴力、冒险和贪婪，以压迫和掠夺他人的方式获取物质享受，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恶霸、地痞和无赖。他们往往结成帮派，各霸一方，扰乱治安，欺压市民。

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给北海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北海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北海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北海；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北海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北海，把一个由独立的中国管辖下的北海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北海。从而使近代北海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北海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统治的压迫，是民族灾难和人民苦难的根源。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

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北海人民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近代北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

自鸦片战争后，北海地区^[2]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典型的有 1850 年的方晚等起义、1869 年的“打抽厘官事件”、1900 年的廉州考棚事件、1905 年抵制美国倾销面粉事件和烧教堂、杀传教士事件等。

方晚、刘八起义。1850 年 2 月，天地会反清武装首领方晚、刘八、钟阿春等部起义，由博白县进入合浦县境攻占石康圩。廉州官军惶恐，知府沈棣辉、知县顾骏谕急调大廉武生彭辉琳、石康武生陈国纲和陈国漠兄弟及庠生陈玉书等率兵进县城，协同官军守御；又令大廉、六湖、石康等乡团围攻义军。义军在石康与乡团力战后撤退。4 月，方晚、刘八联合其他义军进袭廉州，义军因不明敌情，又因受天气影响而退回石康。陈玉书率六湖、大廉乡团与义军激战，义军失利退往灵山武利。5 月，义军再从合浦张黄进入大廉，杀死陈玉书。陈国纲、陈国漠兄弟奉命调往钦县解围，官军钟广与义军合谋，在作战前把陈氏兄弟灌醉，上阵将其击毙。1851 年初，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义军发展迅速。但是，1851 年春，清廷加调潮州兵勇来廉州镇压义军，方晚、刘八误中官军的反间计而自相残杀。官军乘机进攻，义军溃散，方晚转移至合浦常乐镇多蕉一带被乡团逮捕杀害，刘八转战合浦小江、龙门，后来也遇害。

“打抽厘官事件”。1869 年，北海人民不堪忍受贪官污吏的暴政，积怨已久的群众发动了“打抽厘官事件”。北海税卡委员沈懋林在买菜时由于强买强卖，与摊主发生争执，在争执时故意掏枪打死店员邓振基。差役仗势欺人的霸道行径，激怒了群众，围观的人群中有人高喊：“光天化日之际，强买杀人，成何世道，何不一同找厘金委算账去。”被激怒的群众就如洪水一般冲向厘金委，砸了厘金委的牌子，沈懋林被殴致死。随后，清政府调集重兵到北海镇压“暴民”，被称为“匪首”的商人吴明良被捕杀害，其余商人均连夜逃走了。

廉州考棚事件。1900 年，德国传教士巴顾德为扩大传教范围，在廉州强行购买考棚前民房改建教堂，为了反抗外国的侵略，群众愤而拆之。随后，德国派兵舰到北海威胁，廉州知府富纯屈辱议和，以考棚东的同善堂调换，并赔偿兵费 6000 元。

抵制美国倾销面粉事件。1905 年，美国本土发生排斥和迫害华工事件，我国各地展开了以抵制美商为主要形式的反帝运动。北海也不例外，由于美国商人主要是从北海口岸倾销面粉，打击了北海农产品市场。于是北海人民就抵制美国面粉进口，商人以“花旗面粉有毒”为由，拒绝销售美国面粉，市民也拒绝购买美国面粉。结果美国面粉在北海销量大跌，从 1902 年的 8 万担跌至 1905 年的 3600 担。这种经济制裁不仅令美国也令西方列强各国吃惊，驻北海的各国领事均坐立不安，通过英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华人禁止美货一事，非但美商受损，凡各国商务均有危险之虑”，要求清政府出面把人民的抵制运动镇压下去。尽管如此，1906 年北海的

洋华进口仍比正常年份下降了 50%。

烧教堂、杀传教士事件。1905 年，廉州又爆发了反帝斗争，人民群众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烧毁洋人的教堂，杀死 5 名传教士。但这次反帝斗争最终也被镇压下去了。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北海地区人民有着强烈的反抗性，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外国侵略者和北海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农民和一般市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北海，农民和一般市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二、辛亥革命与北海人民早期革命斗争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 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1894 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在美国檀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在钦廉地区，1907 年 9 月，广东钦（县）廉（州）地区人民反对苛捐，孙中山派王和顺领导会党举行钦廉防城起义，攻占了防城，并进军广西。但进攻灵山未克，起义队伍退入十万大山。1908 年 3 月 28 日，孙中山又派同盟会成员黄兴率领武装队伍 200 多人，从十万大山越过中越边界，然后进入钦廉地区的上思县举行起义，连日四败清军，缴枪 400 多支，武装队伍迅速发展到了 600 多人。随后，在数千清军的围攻下，黄兴率领武装队伍转战数 10 个乡，历时 40 多天，终因弹尽粮绝，被迫解散。1908 年，廉州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清政府，烧毁地主绅士和教会的房屋。但在清军镇压下，这次起义也失败了。这几次钦廉起义，虽因遭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显示出钦廉地区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压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在钦廉地区民主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钦廉起义与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虽然从实质上说大多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因而很快失败，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民众中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 年（农历辛亥年）10 月 10 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武昌起义后，合浦籍的同盟会员罗侃廷等回到合浦，在廉州学前街攀龙书室设秘密联络点，从事侦察情报策反清军工作。11 月 8 日，驻北海清军宣布反正，市民敲锣鼓、放鞭炮以示庆祝，军政衙门一律悬挂五色共和旗，降下黄龙旗。

11月17日，罗侃廷率领300余起义人员，并策动驻县新军巡防营反正。义军先打开军械库，武装起义民众，然后分路围政府、县衙门。廉州知府许莹章、北海镇总兵陆廷章以及合浦知县均弃职而逃，义军冲进镇台衙门，擒获清军分统杨尊任并将其处决于县城小南门外。11月18日，革命党人接管府、县政权，成立廉州都督分府，都督陈武（苏乾初）出榜安民。12月1日，清军得知廉州起义的消息后，调集重兵从小董和南康方向对廉州发起攻击。这时，驻北海反正清军二十一营兵变，抢掠外沙货船。北海商会筹办中的商团武装出动震慑，事态未扩大，外国侨民领事也集中做自卫准备。英、法、德各派一艘战舰到北海港接侨，北海军政代表庞玉珊约见各国领事，宣布民军有保护外侨的责任。外舰停港3天后离去。清军二十一营逃往涠洲岛。12月2日，驻廉州反正清军二十四营兵变，结伙抢劫，城内外当铺、绸缎及洋杂铺等均遭洗劫。清军进入廉州后大肆烧杀，城内“大生当”被烧，大火由西门蔓延至槟榔街、三官楼至下街一带，俗称“廉州反正爆街”。起义军被迫撤离廉州，转移到北海，并向广州革命政府求援。广东都督胡汉民派遣安抚使黄济川率领协字民军两标统2000余人乘军舰到北海救援。12月16日协字民军在涠洲登岸，缴乱兵枪械，平息兵变。12月17日，协字民军由北海抵达廉州，平息兵变，打退清军，收复了廉州。协字民军第一标统刘侠民驻防北海。北海、廉州两地人民大放鞭炮，庆贺胜利，所有的船只和屋顶都摘下黄龙旗，改挂国民军政府的五色共和旗，不少男士纷纷剪掉辫子。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也纷纷取得了胜利。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措施。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但是，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1912年1月1日，北海口岸正式采用公元纪年。1月初，广东新军统制龙济光率兵2400余人分乘4艘军舰到北海，协助黄济川治理北海地区。1月20日，龙济光见北海地区安定，率兵1500人返回广州，仍留900余人驻北海、廉州与协字民军共同维持治安。2月21日，中华民国新国旗首次在北海海关升起。此前，外国驻北海官员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故迟迟未升新国旗。2月24日，黄济川率兵1000人返回广州，余部由第一统领翟西明指挥，兼顾北海、

廉州地方治安。1913年2月，众议会选举议员，合浦县议会成立，北海与合浦同属广东省第六选区。7月13日，广东总督陈炯明宣布独立，风传要从北海调回陆军2000人，北海地方人心浮动，商人停止进货，现金汇存香港，市场萧条。8月4日，北洋军阀袁世凯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潜逃，人心始定。但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五四运动在北海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形势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先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拥护共和”的高调骗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继而玩弄权术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败。袁世凯不但下令解散国民党，还解散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并处心积虑地为复辟帝制做准备。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不得不草草收场。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际控制北京政权的则是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目、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随后，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的黑暗统治、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激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不满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组织反袁的武装斗争。但是，中华革命党没有能提出足以动员群众、领导革命斗争的新纲领，其斗争方法也主要是联络旧军队和帮会，组织暴动和暗杀，而不是着眼于发动广大群众，因而他们组织的反袁暴动均告失败。1917年7月，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又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后，孙中山联合一部分赞成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军事力量，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宣布护法讨段。1918年5月，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却遭到挫折。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先是依附于袁世凯，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野心暴露后，转而从事反袁活动。在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后，改良派又依附于段祺瑞。但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改良主张都是不容许的。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遭到失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191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但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组织也还处在秘密结社和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与此同时，农民阶级也自发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但是，农民群众的斗争都因组织形式落后，又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归于失败。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卖国求荣之时，青年学生异军突起，走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前列。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及北京各专科学校的学生2000多人，共同发起向总统府的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秘密军事协定。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学生，也都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对其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四运动在北海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爆发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正当学生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全国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蓬勃发展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他们勾结北京政府妄图破坏学生运动，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就成为五四运动在北海的重要活动内容，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1920年初，以香坪学校的学生为主的北海青年学生率先集会游行，开展反对使用日货运动，销毁日货，劝说市民不要购买日货，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这时，在北海经商的日本间谍中野顺三企图阻止学生的抵制日货游行活动，但北海各界群众声援了学生的爱国运动，使中野顺三的企图不能得逞，并使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迅速与工农结合，掀起了深入持久的群众性查抄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北海青年学生在开展爱国宣传的同时，与各界群众到各商户店铺查缴日货，然后集中在中山公园焚毁。这场抵制日货运动成为北海地区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并对发展民族经济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

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但辛亥革命的流产，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

进步。1916年，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运动后，全国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运动，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北海与全国各地一样，经过五四运动，加速了北海人民的思想解放，北海人民有了新的觉醒，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1921年秋，北海革命先驱钟竹筠^[3]从安铺来北海贞德女子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韩盈^[4]曾几次来贞德女子学校看望钟竹筠，并带一些进步刊物给她看。在韩盈的影响和帮助下，她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从中接受了革命思想。随后，钟竹筠经常给同学劳瑞梅、李玉霞等讲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在进步学生中积极传阅学习、散发革命书籍和报刊，向同学们讲革命道理，讲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妇女解放的道理。并带头剪掉长辫留短发，以实际行动进行革命鼓动，号召同学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政治斗争，从而孕育了革命种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虽然只是初步的，尚处在宣传介绍和学习阶段，但它对北海的影响是深远的，为北海先进分子提供了新的观察和改造社会的科学武器。五四爱国运动极大地振奋了北海人民的爱国救国精神，一批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北海早期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逐渐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迫切需要发动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但这场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或通过农民阶级自发地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都不能获得成功，因而这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与此同时，

工人的斗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开幕，这次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北海革命人民也从此逐步会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

北海人民支援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

由于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和近代工业落后以及北海贸易港口地位，决定了北海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较弱，特别是有着现代意义的产业工人数量更少，少量的以出卖苦力和手工作坊的工人也未能形成一个整体。但北海工人阶级也投入了革命运动，声援五四运动，逐步推动北海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的主要精力是领导工人运动，使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这时，北海虽然尚未建立党的组织，但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形势的影响下，北海工人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

北海工人早期较具有重要影响的斗争，是支援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求增加工资，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领导下，举行同盟罢工。罢工开始后，中共广东支部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号召工人“团结一致，坚持到底”，表示全力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给予支援。罢工规模不断扩大，到3月初，发展为香港各行业10万工人同盟总罢工，使香港的航运全部瘫痪，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食品和生活用品来源断绝。香港海员大罢工坚持了56天的顽强斗争，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工人增加工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海员工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5]。

7月，北海海员和码头工人积极响应和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港口，拒绝装卸外国轮船货物，进出北海的外轮一时中断。北海工人阶级特别是海员和码头工人在这次罢工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逐渐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

从1923年5月22日开始，北海学生也掀起了抑制日货运动，使出口日本锰矿等物资停运。历时近一年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抵制日货运动，有力地支援了香港海员大罢工。

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北海工农运动的兴起

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南路的形势

1921年，孙中山打算依靠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武装力量，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肃清北方的军阀势力。但陈炯明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事业，暗中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策动，并和北洋军阀相勾结，于1922年6月公开发动反对孙中山的武装叛乱，篡夺了广东军政大权。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继续从事军事运动，积极组织武装力量讨伐陈炯明，将粤军许崇智所部作为东路讨贼军，同时又联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部组成西路讨贼军。两路讨贼军于12月25日开始讨陈行动，陈炯明于1923年1月15日被迫通电下野，离开广州，退守东江。1月16日，滇、桂各军乘胜进入广州。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后，滇、桂联军多次击退叛军陈炯明、沈鸿英部的进攻，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这样，在广东初步形成一个高举国民革命旗帜的根据地，并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步巩固，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成为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阵地。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对其进行改组。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采取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10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孙中山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使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重新解释，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后人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迅速形成。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它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广州刚刚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层阴影。杨希闵、刘震寰的部队是

军阀部队，压迫和剥削人民是他们的本性。杨希闵、刘震寰分别挂上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的头衔，暗地里却大搞反革命运动，多方掣肘孙中山，阻碍和破坏革命。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继续与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1924年初，在北洋军阀曹錕、吴佩孚、段祺瑞的支持下，陈炯明与湖南军阀赵恒惕，云南军阀唐继尧，广东内部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和南路军阀邓本殷相勾结，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再占广州，恢复军阀统治。

在南路地区，1920年9月，粤军第四路军司令黄明堂率部由雷州开进合浦，与粤军钦廉军司令黄志桓合谋进攻由桂系军阀任命的钦廉镇守使陆兰清。桂系军来援，粤军一度退却。待桂军撤退回广西后，陆兰清即通电反桂，回师广州。黄明堂、黄志桓部乘机于11月占领廉州。1921年6月，桂军申葆藩部攻占廉州，黄明堂、黄志桓退往海南。后来时局剧变，桂军挫败回桂，粤军黄志桓部复进占廉州，黄明堂挥师入桂。7月20日凌晨，滇军1000人由蔡炳寰、颜作标率领从雷州撤抵合浦后，要求进入廉州城，遭驻城守军黄志桓部马德云拒绝，滇军乃发起攻城，数昼夜不克。7月23日，黄志桓率大队从海南回援，与滇军交战于北海岭底，接战不利，退守高德。廉州守军坚守7天后乘夜撤出，滇军入城。这时，粤军师长黄大伟、团长王定华率军进入廉州，迫滇军撤至合浦总江听命缴械，接受编遣。

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发动反对孙中山的武装叛乱时，孙中山任命驻守合浦的国民党第四路军司令黄明堂为南路讨贼军总指挥。7月13日，黄明堂率军进驻北海。随后，黄明堂率军东进高雷讨伐陈炯明。8月13日，黄明堂部在高州、化州与陈炯明嫡系黄强、钟景棠部激战失利，退守廉州。10月，陈炯明任命“民团总办”苏慎初为钦廉督办，苏慎初策动驻廉州的黄明堂部统领丁守臣叛变，黄明堂部被迫退守钦县，苏慎初部占领廉州、北海。1923年1月初，黄明堂分兵两路从钦县、灵山进攻合浦。当黄明堂部兵临廉州西门江两岸时，驻廉州的苏慎初部据守东岸，黄明堂部转取北海。1月15日，陈炯明被迫通电下野后，苏慎初部撤走，黄明堂率部进入廉州。

1923年夏，军阀邓本殷、申葆藩盘踞广东南路的钦、廉、琼、崖、高、雷、罗、阳八属。邓本殷与申葆藩协商组织南路八属联军，扫荡林树巍、吕春荣等盘踞八属的其他部队，使八属地区成为八属联军的一统天下，并联名发出通电说：“天祸吾粤，客军入境，迭遇兵灾，以苦吾民，吾粤南路八属为弭兵祸，宣布自治，保境安民。”接着，建立了八属联军，邓本殷为总指挥兼左翼指挥官，申葆藩为副总指挥，黄志桓为总参谋长，苏廷有为右翼指挥官，陈德春为中路指挥官。八属联军统辖地区，包括高州六县、雷州三县、钦廉四县、两阳及罗定的南部和琼崖全岛。八属联军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横行霸道，作恶多端，为害广东南路地区。9月5日，八属联军邓本殷部进攻北海，黄明堂虽然率领队伍奋勇抵抗，但寡不敌众，便率领队伍乘“永丰”舰撤往廉江安铺。1924年1月19日，八属联军进入廉州。从此，邓本殷、申葆藩对钦廉地区实行军阀独裁统治，在经济上穷极搜括掠夺，使得钦廉地区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1924年春，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被任命为广东钦、廉、琼、崖、高、雷、罗、阳八属军务督办。林俊廷派3个旅共4000余人进驻廉州、北海。5月，设八属军务督办于廉州，孙中山命林俊廷即发讨伐邓本殷通电，林俊廷以先得军饷枪械为条件。6月，林俊廷部进驻北海，接收北海盐务稽核所，将所有税款充军费。同时，严禁铜元流入北海市面。7月初，广州元帅府派“永丰”舰运载饷银3万元，子弹10万发开抵北海援助林俊廷。林俊廷却意在获取饷械及地盘，对讨伐邓本殷军事行动拖延敷衍，犹豫不决。申葆藩表面欢迎林俊廷，以劝邓本殷让出高雷地区相迷惑，并拨所部张瑞贵旅归林俊廷指挥。11月，邓本殷先头部队进至合浦山口，林俊廷始匆忙通电讨伐邓本殷，两军对峙月余，于12月底交火，申葆藩部张瑞贵旅火线倒戈，林俊廷在山口失利，仓皇退守钦县，廉州、北海复归八属军阀统治，邓继堂为北海卫戍司令。

1924年秋，由国民党右派挑起的事端刚刚解决，广州又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镇压了商团叛乱，给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势力以有力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为了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接受发动北京政变的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冯玉祥等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1925年1月上旬，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举兵进犯广州。同时，陈炯明又联络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做内应，并派人去北方要求段祺瑞政府给予帮助。沙面租界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大肆鼓噪，制造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舆论，配合陈炯明的进攻。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广州革命政府于1月15日发表了《东征宣言》。接着，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于2月初分三路讨伐陈炯明。至4月，东征军击溃陈炯明主力林虎部，并控制东江地区，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各种反动势力企图利用革命营垒的暂时困难，阴谋叛乱，推翻广州革命政府。5月13日，廖仲恺到汕头，与讨逆军总指挥蒋介石以及许崇智、朱培德、加伦将军等会商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的计划。6月11日，讨逆军对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发起攻击。至6月底，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全部被肃清，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胜利结束。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湘、滇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平定商团、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接连胜利，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连遭失败。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在找不到机会直接侵略时，就支持广东军阀陈炯明挑起国内战争。1925年秋，在港英殖民政府援助陈炯明的同时，北京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也纷纷援助陈炯明，国民党右派势力也声援陈炯明。因此，陈炯明在国内外反动派的帮助下，重新发动对革命的进

攻，还同时勾结北路军阀熊克武和南路军阀邓本殷，从东、南、北三路对广州形成夹击之势。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残部，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9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苏联顾问罗加觉夫担任军事顾问。至11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1925年10月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之时，南路八属联军倾其全力向阳江、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进犯，配合陈炯明夹击广东革命政府。10月31日，国民政府组织南征军，讨伐八属联军，并成立“南路联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培德为总指挥，朱克靖为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成立了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书记黄学增。11月初，南征军分兵四路分别从台山、开平、新会、罗定和广西陆川出发，进军南路，讨伐八属联军，在高州歼灭其主力后，第一路军陈铭枢率领第十师会合第四路军新桂系部队俞作柏部疾行军通过廉江进入合浦县境。邓本殷率残部由高雷地区溃退到海南岛，申葆藩率其余残部则逃窜到廉州。11月下旬，在俄国顾问孔节史的协助下，陈铭枢率领第十师与俞作柏部合击廉州，申葆藩闻讯仓皇率残部撤出廉州，连夜逃往钦县。11月3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进驻廉州。12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进驻北海。邓本殷、申葆藩同时通电下野，统治钦廉地区达两年之久的军阀政权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其他各路军分别攻克雷州、高州、钦县。至此，在南路大陆的八属联军残敌基本被肃清。1926年1月中旬，南征军渡海作战，收复海南岛。至2月底，邓本殷逃亡，南路八属联军全部被消灭。

1926年春，随着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使四分五裂的广东迅速获得统一，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北伐战争和推动全国革命运动发展准备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进驻廉州、北海时，第十师政治部内的共产党员李任予、黄竞云和共青团员徐瑞华随军到廉州、北海，在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市民中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党的主张和政策，向廉州、北海的工人、青年学生和市民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励他们参加革命；并发动群众开展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帮助他们建立起了各种组织，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使北海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北海人民支援省港大罢工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上海五卅惨

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6月19日，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声援上海五卅反帝斗争。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制造了血腥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之后，全国人民极为震怒。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中国共产党告罢工工友与民众书》，号召全省人民团结一致，声援和支持省港大罢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下，广州市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拉开了全国人民声援省港大罢工的序幕。

由于北海是个外贸口岸，有着定期轮船来往香港和澳门，因此省港大罢工的信息很快就传到了北海。7月，在国民革命军未到达北海之前，北海人民就自发地组织了声援省港大罢工的群众运动，由各界知名人士自发组成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发动市内商家拒绝销售日货。同时，成立北海各界民众后援会，捐毫银2000元支援省港大罢工。10月，以码头工人为主组成北海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简称罢工纠察队），重掀抵制英、日货高潮。罢工纠察队在海上阻截过往的英、日轮船，沿街查缉进口货物，一发现日货即封存没收；学生武装巡查港口，禁止接触英、日轮船和货运出口；小学生则在老师的带领下沿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青年们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但这时北海仍在军阀邓本殷统治时期，北海当局以禁止干涉贸易为名，压制人民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援。12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十师进驻北海后，在共产党员李任予、黄竞云和共青团员徐瑞华等的组织和领导下，北海人民支援省港大罢工的运动迅速发展。北海工人自动起来抵制邓本殷以“不得影响贸易”为借口而行破坏省港大罢工之实的媚外政策，12月25日，英轮“陆逊”号抵北海港，被罢工纠察队阻止卸货，被迫返航香港。与此同时，口岸厉行检疫禁止外轮进出。自此，北海港外轮绝迹近一年。1926年1月，驻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李笠农致电函请广东省罢工委员会增派工人纠察队员前来北海加强口岸管制，省工人纠察队一行数人由黄镜如、欧兆辉率领应邀抵达北海，成立“截缉办事处”，具体部署查缉外轮工作，制止英轮进港卸货和英、美传教士各一人上岸，逼使英轮停止香港至北海的航运，有力地配合广东省罢工委员会，达到了封锁香港的目的。

省港大罢工后，全国各地掀起募捐浪潮，帮助解决数十万香港工人的生活问题。北海也开展了“援助省港罢工周”，进行募捐活动。3月中旬，第十师政治部电告广东省罢工委员会，告之“在北海、廉州等地约集各界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大会，唤起民众为我工友后盾，并向各界募捐”。为了开好“援助省港罢工周”大会，北海、廉州两地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成立“援助省港罢工募捐委员会”，内设布置、文书、劝捐、宣传、纠察、救护、收支和交际等8个办事机构。3月27日上午，各界组织的演讲队分头出发，在街头、巷尾、渔农村向群众作宣传动员。当天下午1时，北海各界群众近万人在中山公园广场举行“援助省港大罢工周”大会。会上，北海市政筹备专员黄祖培、第十师政治部主任李笠农、参谋长戴石孚、省港罢工纠察队长欧兆辉、市罢工纠察队长彭天维等先后发表演说。会后，举行大游行，群众高呼着口号，

列队巡行，沿途不断地散发传单，广大群众向设置在会场内外的募捐箱捐款。整个活动场面热烈，声势浩大，群情激奋，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随后，将募捐得的大洋2000元汇给广东省罢工委员会，支援省港大罢工。5月，北海市商民协会成立，协会组织全市商民积极参加抵制英货，封锁港口，禁止英轮、英籍人员入境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

北海贞德女校的反帝斗争

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盘踞，帝国主义列强的各种建筑和设施占市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控制着中国主权，掠夺人民财富，骄横自大，俨然以北海主人自居，动辄就以军舰大炮相威胁。对于北海掀起的大革命运动，他们本能地持着敌视和破坏的态度。然而，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大革命运动，理所当然地将那些敌视革命的帝国主义作为革命运动的对象，在大革命洪流冲击下，群众也起来对他们进行斗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1925年秋贞德女校反对校监董恩典的斗争，即北海贞德女校反帝斗争。

北海贞德女校校监中国名叫“董恩典”，原是英国的一位洗衣妇，但对中国学生却十分苛刻和傲慢，常常无缘无故地打骂和体罚学生。曾有一次一个叫张德恩的女学生，只因爱唱爱跳，用筷子敲着锅炉打节拍，被董恩典毒打过后禁在监管室里，因此该校的学生对她既恨又怕。但是，当董恩典公开诬蔑大革命运动、蔑视中国主权的时候，这些青年女子也勇敢地起来与她进行斗争。

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这一系列事件在北海引起了震动，市民和学生连日不断地游行示威，募捐和演讲。因此，贞德女校的学生也深受感染，她们手持三角小红旗加入到示威队伍中去，但却遭到董恩典蛮横的阻挠和反对。为了阻挠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董恩典宣布了开除一批“不听话”的学生的名单。这一决定遭到全校学生的强烈反对，全体学生举行集会，坚决要求董恩典收回这一无理的决定。董恩典却盛气凌人地赶往会场，企图驱散集会的学生。但见学生不理睬她，她却恼羞成怒，一把将悬着的国旗扯下地，边踏边骂学生。董恩典的行为引起在场学生的愤怒，沈卓清、张达超等立刻上前与之论理，责问她：“为什么要践踏中国国旗？”“为什么要骂学生？”“为什么要开除学生？”并要求董恩典当场向学生赔礼道歉，向国旗三鞠躬。董恩典这时不但不认错，而且要学生滚出校门，不让他们读书。愤怒的学生立刻冲上街头，宣布全校罢课，组织游行示威，向群众揭露董恩典的逆行。贞德女校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全市人民的支持，其他教会学校也对她们纷纷表示支援。

为了继续与董恩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示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不满，张达超、沈卓清、罗道成等人，在热心商人的支助下，另租民房，开办超光女子小学，专门招收原贞德女校和社会上失学的儿童就读。在这期间，她们还多次组织游行示威，到贞德、华文等教会办的学校去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董恩典”等口号。在北海人民反帝浪潮的冲击下，贞德、华

文等一批教会学校停办了，董恩典只能灰溜溜地回国。

贞德女校反对董恩典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得到驻北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的支持和指导。第十师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李任予、黄竞云，共青团员徐瑞华等与学生沈卓清、张达超等密切接触，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她们的觉悟，动员她们参加革命，教她们学唱革命歌曲，带领她们搞宣传、集会、示威游行。同时警告教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主权，不得以宗教迷信侵害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对那些作恶多端的洋鬼子，第十师也顺应民意严加打击。《国民周刊》1926年第三期就登有一则消息，报道说：“前时曾有一英国人在这里（指北海）筑有洋房一所，十分华丽，门前树木空地甚多，这洋鬼子甚为混蛋，在邓本殷时期，贩卖人口，在楼内私设烟赌，招人入局，无恶不作。当邓本殷逃亡、革命军到了之后，董恩典依然如故，北海市民对她恨之入骨，便密禀师长。师长立即派人前往查抄，果然在校内查出女子3人，烟土甚多，于是董恩典签字，驱逐出境。”由此可见，北海人民反帝运动已深入人心，北海人民正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大革命运动。

北海农民运动的兴起

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5%以上，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是大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大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和广东国民政府对农民革命运动寄予高度关注，注意发挥他们主力军的作用，1924年6月，中共通过国民党中央，在广州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1925年5月1日，广东成立省农民协会。10月，革命军南征时，省农会派遣了黄学增等12位同志，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随军出发，开展农民运动。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师进驻合浦廉州、北海时，该师中的中共党员李任予、黄竞云和共青团员徐瑞华等随军到达北海、廉州，动员群众开展革命运动。钦廉农民运动特派员苏其礼、王会东、廖华卓、敖华袞等奉广东省农协会派遣也随军到廉州、北海，领导钦廉地区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开展农民运动工作时，着重发动一批农民积极分子，组建农民协会。1926年1月上旬，农民协会的组建工作首先在廉州近郊的何屋坡、校场坡、平田等主要村庄开展起来。在合浦公署（即县政府机关，县长钟喜麇）的领导下，肃元彬以农会委员的身份，在何屋坡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农会，向农民宣传：“组织起农会，不受人欺霸（欺侮），组织起来力量大。”当即有近80人申请加入农会，经广东省农协会批准后发给农会会员证。1月中旬，经广东省农民协会批准，合浦县第一区何屋坡乡农会正式成立，这是北海地区成立的第一个乡农会。1月下旬，苏其礼在平田杨屋村召开农会会员大会，100多人参加会议。会上，苏其礼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并宣布把乡农会改为乡农民协会，成立廉州郊区何屋坡乡农民协会。3月7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在梅菪成立，办事处主任黄学增、书记韩盈、委员苏其礼，负责开展南

路地区十五县二市的农运工作。在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的发动和指导下，合浦县农会组织工作迅速铺开，又成立了东校场农民协会和平田农民协会。随后，吴屋坡、石头岭、双江桥等村也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冯道先回家乡闸口山子背村组建了农民协会。3月，广东省政府批准北海为独立市，脱离合浦县。在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的发动和指导下，苏其礼、王会东等在北海积极开展组织农会工作，北海市郊最早成立农会的是铜鼓岭村。随后，石子岭、垌尾、沙湾、红路岭等村也先后成立了农会。

农民协会为改变农民受地主残酷剥削、生活贫苦的现状，提出“三三四减租”的口号，即佃农收获粮食的三成交地主，三成交政府，四成留给自己。如果按这口号去实行，将会大大地减少地主的收入，因而地主大为不满，散布谣言，极力诋毁。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阻挠，结果这一办法没有实行。

农民协会另一重大措施是支持妇女的解放斗争，提出“反对差奴使婢”、“反对三妻四妾”等口号。在农民协会的支持下，许多地主的婢女、妾侍纷纷上诉，要求摆脱奴役，获得人身自由。每天前去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上诉的人络绎不绝，使妇女的地位不断提高。

为了巩固和发展农会组织，农协会经常举办培训班，培训农会骨干，增强他们的革命意识，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5月，苏其礼在廉州中学召开千人参加的农协大会。会后，留下一批骨干分子进行为期7天的培训，由苏其礼主持演讲，为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干部。

随后，国民党新右派逐渐改变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由限制而至反对工农运动，使农运的发展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为了克服农运发展中的困难，广东区委于7月下旬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农民运动问题，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农民运动“目前最低限度的政纲”：在经济上，主要要求减原租25%，废除苛杂和禁止奸商囤积居奇等；在政治上，主要是召开乡民大会选举民团长、乡长，农民有参与乡政和请求撤换县长的权利等。8月下旬，广东省农协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区委扩大会议精神，制定了《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北海地区农民协会根据广东区委和省农会扩大会议精神，决定以实现农民运动目前最低限度的总要求为中心，全面开展二五减租运动，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巩固农协会权威，把农民运动继续推向前进。由于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壮大，1926年底，成立了合浦县农民协会和北海农民协会，主任分别为肃元彬和朱维智。合浦县农民协会下辖7个乡村基层农会：何屋坡农民协会、东校场农民协会、吴屋坡农民协会、石头岭农民协会、双江桥农民协会、平田农民协会、闸口山子背农民协会，全县农民协会会员有1000余人。北海农民协会下辖8个乡村基层农会：垌尾农会、石子岭农会、铜鼓岭农会、沙湾农会、红路岭农会、十二间屋农会、牛角塘农会、驿马农会，北海农民协会会员近1000人。

农民协会常用集会和游行等形式，教育会员和其他农民，扩大宣传和影响。北海农民协会、合浦农民协会分别在北海中山公园、合浦东校场多次召集会员和群众集会，上街举行游行示威，人数有时多达数千人。游行人员高举犁头旗（农协会的会旗），手执三角小旗，不断高呼“打

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实行三三四减租”等口号。农民第一次上街游行时，遭到一些封建士绅的冷嘲热讽，说什么“村佬游街”，农会会员十分气恼，将情况报告县党部，县党部表示：“谁讥笑农会就打倒谁”。因此，封建士绅再也不敢嘲笑农民了，农会负责人也经常被地方当局请去开会、议事，农民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12月，北海农工商联合会成立，北海农会主任朱维智也是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几千年来，一直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从此因为有了农民协会而真正感到扬眉吐气。

北海地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使地主阶级大为震惊。如闸口山子背村成立农民协会后，附近的地主均连夜出逃。农民运动持续了一年多，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了农民运动，它对于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军南征胜利的成果、支持北伐战争、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促使广大农民的觉醒，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经过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主张便迅速为北海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所接受；党的三大召开后，中共广东区委加强了北海工作的领导，北海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从而为中共北海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并为大革命高潮在北海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1]钦廉地区即钦廉四属，原指合浦县、钦县、灵山县和防城县，今指北海市（辖合浦县）、钦州市（辖灵山县、浦北县）和防城港市（辖东兴市、上思县）。

[2]北海地区原指北海市（1912-1925年北海属合浦县管辖；1926-1929年建立独立市，脱离合浦县；1930年撤市复归合浦县管辖；1936-1950年曾划分为东、西两镇，先后由区和县管辖；1951年由镇升格为广东省直辖市，再次脱离合浦县）和合浦县。今指北海市和钦州市的浦北县。

[3]钟竹筠：遂溪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1926年任中共南路特委委员、妇女部长。

[4]韩盈：遂溪县人，当时是在广州铁路工程学校学习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南路特委委员、遂溪县委书记。

[5]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广东海员工人运动史》、《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